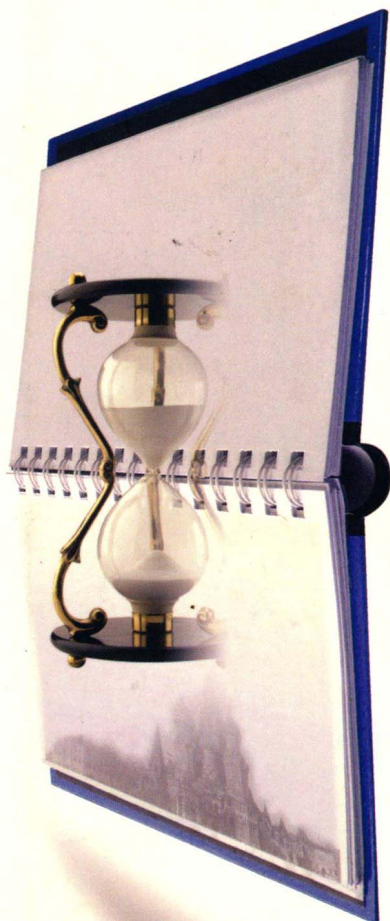


論市場社會主義

A Future for Socialism



羅莫爾 (John E. Roemer) ◎著
馮建三 ◎譯注

► 國家科學委員會經典譯注計畫

現代名著譯叢

論市場社會主義

A Future for Socialism

羅莫爾(John E. Roemer)◎著 馮建三◎譯注

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

現代名著譯叢

論市場社會主義

2005年1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	John E. Roemer
譯注	馮建三
發行人	林載爵

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叢書主編	簡美玉
校對	崔小茹
封面設計	翁國鈞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樓

電話：(02)27683708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811-0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@udngroup.com

Copyright © 1994 by John E. Roemer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譯說明

- 一、謝謝張時健先生協助翻譯本書的數學公式及說明文、繪製正文與附錄的各圖表，以及協助校閱翻譯稿並指出謬失之處，惟任何錯誤，無庸贅言，都是譯者的責任。
- 二、原書將注釋放於書末，譯本採當頁注。除原注釋外，另加十餘個譯注，針對書中特定關鍵概念或議題所製作的七個「中譯附錄」則因篇幅較長，依序放置於書末。
- 三、本書譯名採《論市場社會主義》，考量有三。第一是這更符合本書的內容。其次，此中文名並沒有說，未來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作者所主張的模式。第三，以英文來說，作者遠較為謙遜，作者羅莫爾只說，他認為未來一段時間裡，若社會主義尚有前途，則必然是一種「市場社會主義」，但是否為其版本的「市場社會主義」，仍不可知；並且，進入市場社會主義後，也不代表人類制度文明就此不再演變，更高層次的社會主義可能出現，而退步的、反動的人類秩序也可能復辟，或竟倒退。
- 四、本書英文名與1957年出版的修正路線社會主義專書，題近而口氣差別不可以道里計。後書的作者柯羅藍(Anthony Crosland)，取書名為《社會主義的唯一未來》(*The Future*

of Socialism, 1957)。該書認定社會主義與其說是一種以公有產權為基礎，且更為優越、有效率的經濟體制，不如說它是一種追求平等諸目標的道德訴求，因此通過凱因斯式的國家宏觀介入，以財政與賦稅手段配合混合產權，而不必然是公有產權為主的生產體制。本書則「論稱」社會主義的「一種」未來。

五、譯者的導讀、譯注與附錄只述不作，不待贅語，雖非本意。從1997年初開始接觸市場社會主義文獻至今，時斷時續，七載有餘，猶不能有創見，有關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，業已逐漸引入西洋(主要是英語)市場社會主義諸論說的歷程，也未能盡量引入並給予評價，實有不甘與汗顏，惟距離本翻譯案期滿日已近，再不結案，不但有違國科會前人文處長王汎森院士對本譯著的支持，亦將干擾譯者他項寫作與活動。略書自慚之意，實非推諉，尚祈見諒。

中譯導讀

挑戰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力量，必將繼起，持續綿延。我們必須提出更清楚的願景，呼應與支持這樣的挑戰，指認可能的世界面貌，是些什麼。

——施偉卡特(Schweickart), 2002: XV

「市場社會主義」作為一種「真實的烏托邦」

繼1993年出版《反資本主義》之後十年，施偉卡特這位哲學、數學博士並鑽研及開設經濟學等課程的美國教授，再以昂揚的口吻，出版《資本主義之後》。

施氏表明，《後》是具有「實作」意向的理論之作，《反》則是純理論意向的理論作品。他也反省，何以歷經經濟新自由主義猖獗未歇的1990年代，客觀情勢猶容許他發此激越之聲而有《後》書，務求與更多讀者對話¹。

1 施偉卡特指兩類因素督促他出版《後》書。一是他的個人體驗。1997年西班牙《反》書的譯本推出後，出版社次年安排他展開巡迴演講。這次經驗及其後他在美國多次演講讓他深信，很多立意良善的社運與工運積極分子，需求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方案，相當急迫。二是外

如同封建王朝，資本主義也只能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，終將謝幕。但其後若仍有人類社會，並沒有必然進步於今的保證，是以，善事體察與分析現狀所透露的可能空間，標舉規範價值與行動者互動或導引其努力，求能對抗倒退反動的價值與勢力，自當是一項重要的知識建構工作，於焉進步而「真實的烏托邦」理性營造，方見可能。

本導讀的寫作策略

作為「真實烏托邦」的模式之一，各種形式與重點的「市場社會主義」之倡議與辯論，由來已久²。由於相關文獻繁複，這篇述而不作的導讀，採取了兩步驟的寫作策略，說明如後。

第一，先將英語文獻粗分作四類，然後考慮三個因素之一

(續)

在情勢的客觀發展。首先是所有非歐洲系統的共產國家，並未崩潰，這與人們的預期不同。其次是，崩潰者並非至今仍自稱是「實存社會主義」(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)國家的經濟(如中國、古巴、越南等)，而是努力想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(特別是前蘇聯等)。再就是全球不穩定度的急遽增加，如施氏1995年在義大利目睹150萬勞工關廠數日、1999年11月西雅圖「震驚世人的五日」以來至今，都有反資本全球化、另類全球化的運動……等等在進行。2001年的「911事件」也是反體制，但施氏比之為1930年代納粹運動，兩者均是對資本主義情境的反應，但言其健康則未必。施氏說，這些及歐洲新納粹分子的崛起，在在強化了他的看法，「世人需要有別且能替代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『進步』方案」。

- 2 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、提出「矛盾階級屬性」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教授賴特(Wright, 1996)輯有一書，蒐集了16位學者評述本書「市場社會主義」模式的文章(詳後)，該書即為「真實的烏托邦」(the Real Utopias Project)系列書籍的一本。

(或以上)，挑選作者，製作為表1：撰述較豐、有代表性、本書正文未提及。至於本書已有較多篇幅述及的重要市場社會主義代表人物，如藍格(Oscar Lange)、布魯斯(Wlodzimierz Brus)與諾夫(Alec Nove)(以上參見本書第四章)，不再置語。海耶克(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)與斯帝格利茲(Joseph Stiglitz)這兩位相去27年、先後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，則因在另作詮釋或提示之下，顯得認可政府干預或「可以」是市場社會主義者，所以亦予列入。

第二，逐次介紹表1各人，惟因亞伯特(Michael Albert)與卡力尼可斯(Alex Callinicox)近日(2003年底)的新作與(市場)社會主義有緊密對話，因此除在中譯導讀提及，譯者另成附錄介紹他們的觀點(中譯「附錄7」)。討論作者羅莫爾的文字眾多，但取原書在1994年出版後，他人的回應為主。

表1 主張與反對市場社會主義者的分類，以英語文獻為限

	主市場社會主義	反市場社會主義
(源出) 馬克思主義者	Blackburn	Callinicox
	Roemer/Schweickart	Devine and Adaman
非或反馬克思主義者	Stiglitz	Hayek
	Yunker	Albert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整理。

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與市場社會主義

海耶克作為經濟新自由主義宗師之一，不單反市場社會主義，而且是反對所有形式的社會主義，並無疑問。不過，海耶克是否主張自由放任，曾有思想史研究者略提疑義，比如，他曾在1944年的《到奴役之路》(pp.120-1)說，「確保一個人最起碼的衣食與住宿水平，使其能夠保持健康及工作能力，毫無疑問，是必要之舉」、「以國家之力，協助人們創建一個廣泛的社會保險體系，是非常必要之舉」(a very strong case)³。

譯者提示海耶克這個或有出人意表的意見，可能使得服膺海耶克而反政府干預的人，在詫異之餘，重新思考市場與政府的關係，也可能使其淡化這個意見。若能如此，這其實顯示了發言者的身分、色彩與位置，以及其發言內容的是非，很多時候不能完全分隔，而是會提供基礎，使得因人舉言或廢言的情況得以存在。

假使以上對海耶克的提示，不免引發爭端，則斯帝格利茲

3 然而，在1976年為該書寫新序時，海耶克又說，1944當年，他沒有完全從干預主義者的迷信中解脫，以致於彼時的許多讓步，如今想來實在沒有必要。這兩段引文都取自克雷威爾的詮釋(Cladwell, 1997: 1870)。克氏的論文堅稱海耶克絕非自由放任者，雖然海耶克強調自發的秩序，長期演化後，自可產生料想不到的好結果，任何修正的企圖都將招徠意想不到的後果。錢永祥(2002: 185-90)檢視海耶克的這種演化論，指此說固然為某些自由主義者所喜，卻不能與自由主義不能迴避的評價問題對話，以致無法「發揮批判或規範的作用」，於「思考制度」也就沒有用處。似乎，與其稱海耶克為自由主義者，不如說他是演化論者，或是某種不為錢氏認同的演化論自由主義者。

的立場是人民資本主義或市場社會主義，同樣也有爭議。施偉卡特(Schweickart, 2002/2003: 262, 271, 278)多次強調，斯氏在《社會主義走向何方》(*Whither Socialism*)一書，再三指出股市無助於投資基金的配置效率，而「銀行配置，儘管絕非毫無麻煩，可能更為有效」；羅莫爾(Roemer, 1995: 126, 128)的〈反海耶克宣言〉不但重引斯氏以上觀點，他並且另從資訊經濟學的角度，指其分析架構與方法，應當能夠讓人推論，斯氏也許會選用「人民資本主義」來總結他的模式。

不過，羅莫爾還是論稱，既然斯氏主張，「我們並無理由認為，無情競爭的市場經濟定然比有節度的競爭之市場經濟，來得更有效率」，則斯氏應該會贊成其市場社會主義模式。對此，〈海耶克與社會主義〉長文的作者提出異議，他認為該書，「最好是視為揚舉資訊經濟學之作，主要用意在於質疑社會主義的可行」，不應放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文獻，因為《走向何方》一書，引市場社會主義論辯之處是個位數，引述斯氏自己先前的作品則達122次。(Caldwell, 1997: 1877)

楊克的市場社會主義

反對社會民主派、人民資本主義之論的楊克(Yunker, 1997: 21,72)從1974年就倡議市場社會主義。他與羅莫爾相同，兩人同樣能夠與主流經濟學對話，他們都遵奉新古典均衡分析，主張「利潤導向的市場社會主義……這個模式可說是極盡漸次演化、邊際效用與點滴增加的取向……與當前經濟典章制度及當代資本主義的諸多過程，乖隔僅屬有限」，差別

「僅」在產權。(1995: 685)

在此模式下，楊克認為可設一全國性機構，暫且名之為「公共產權局」(the Bureau of Public Ownership, BPO)，接收個別家戶所持有的股票、證券與其他金融工具，原金融單位所持有的股票等無須移交BPO，可維持原樣。

BPO的角色如同資本主義底下的董事會，但功能在於設定企業的利潤目標，不能干涉經理人員的各種決策(有關生產產品種類及其產量、價格、行銷預算、盈餘保留額度、投資程序等)。這也就是產權要與經營權確實要能完全分離，人事權也僅止於任命總經理，其餘需由總經理決定，BPO須貫徹分層委任的原則，因此全國性BPO之外，各地又有許多地方BPO，其收入來自各地企業支付給全國BPO的部分利潤，至於中小企業，仍可由私人擁有⁴。

可能因有意在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引入相關討論，楊克的舉例具體而生活化⁵、他的言語溫和、態度與人為善，他並認

4 楊克(1995)這篇文章介紹了七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，也扼要回應了對這些模式的批評，惟他幾不引歐洲學人關於市場社會主義的作品。楊克的書寫及舉例適合作為初步教材，除前引文外，《經濟民主》(Yunker, 1997)亦見特色。《經》正文已達333頁，卻不作注且無文獻徵引，顯見作者有意藉此使自己的作品，更能推廣，該書文末附17項子題「導覽」市場社會主義文獻(達50頁)，有其分類參考價值(pp. 335-84)。

5 比如，他再三反對未勞動即獲得之收入(uneared income)，包括股市等金融交易、炒作之所得、繼承收入等，至於企業精神、勤勞乃至於(影視／職業球員等流行文化)明星的高薪則可容許(Yunker, 1997: 58-97, 106, 134)。又如，他說，若放棄公共產權主張，而代之以累進稅、產業的規範及各種福利手段，只是社會民主派，他們主張的累進稅大多取自中產階級而非上層，以致「他們自己的生活標準可能不會

爲，僅在一國之內，也可長期實施市場社會主義⁶。

他說，只要(如，美國)中產階級有機會認知，其家戶每年形同被當前資本主義社會(以美國1990年代中期爲例)剝奪了2600美元，則他們必願意選擇他所主張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。既然最終每個人都會爲此得到好處，這就「提高了每個人終將受此啓蒙的可能度」，即便如此，推進這類認知的首要工作是，「遊說必須非常保守與低調。至於邏輯上說理不清而散亂，修辭浮誇，情緒上歇斯底里地攻擊資本主義，均須刻意又持續地避免。」(Yunker, 1997: 56-7, 312)

楊克對改變之可能動力，除寄望善意外，實無分析，這就使得他的論證，不無一廂情願之處，招徠了很大的譏諷、甚至輕佻。(Brown, 1998)相比之下，楊克引爲盟友的本書作者羅莫爾，行文固然不是沒有催促實踐的意圖，但羅莫爾的論述重心，仍然著重於理念層次的爬梳，也就是就理論談理論，申述

(續)

受到太大影響」(p.24-5)。他也說(p.138)郵政、教育與「主要公用事業」(essential utilities)等不應受利潤原則所支配。

- 6 許多的論述都說，經濟既已全球化而資本可四處移動，國家勢將失去作用。對此，他的答覆是，所謂(金融)資本之移動，卻不能否認「金融資本底下是物理資本，金融資本的高度可動，並不同於物理資本具有相同程度的移動可能。資本家移民無法帶走工廠與機器，而就最後之分析來說，這些機器與工廠才是他們資本所得之來源。」(Yunker, 1995: 710)不過，楊克有其讓人不解的言語，如「美國富有，而世界人口眾多，且大致稱貧。富者總受貧者之羨慕，悶聲不響的怨氣，假以時日，遇有適當情境，則往往爆發爲公然的敵意。美國保有若干核子武器，方可確保未來不致有『非法移民』在坦克前導下，突如其來地進入美國。」(Yunker, 1997: 292)這讀來更像是種族論者，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發言。

「市場」與「社會主義」並無不能結合之處。表1左上角的布雷克朋(Blackburn, 1991)，也是屬於這個情況。不但如此，既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，則除了對於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不能不廣泛且深入發言之外，他們也得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，對於聲稱以馬列主義建國的(特別是歐洲)「實存社會主義」(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)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解體這段期間(特別是經濟)的表現，提出見解。

放進市場：馬克思主義的「思想解放」

首先，羅莫爾與布雷克朋都局部肯定蘇聯時代(特別是1920-30年代到二戰時期)至1970年左右的經濟表現(見本書第五章)，其中布氏更提醒世人，蘇聯的存在有其「外部效益」。這裡是指前蘇聯對西歐形成壓力，是促成西歐走向福利國家的原因之一⁷。其次，兩人各自檢視馬克思(主義)的文獻，佐以發掘馬克思(主義)的內在邏輯，進入「思想解放」之旅，建構市場社會主義，匯通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⁸。

7 比如，布雷克朋說，「愈是鄰近蘇聯的國度，社會福利愈是慷慨……西歐如今仍在享受1945年的果實」，蘇聯亦對第三世界(包括中國)解放運動之鼓舞，產生重要作用。(Blackburn, 1991: 24；另見Golan, 1988)

8 本書第一章已明示，作者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，得力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羅爾斯(J. Rawls)的分配正義觀甚多。另據段忠橋於《在自由中失去》(Roemer, 1988/2003)的譯序，該書標示了羅莫爾的研究重點，業已轉入了政治哲學。遠比市場社會主義更激進的主張，亦認知馬克思主義者應大力借助自由主義者的分配正義概念。(參見中譯「附錄7」)此外，凱茲尼爾森(Katznelson, 1996)秉持米爾士(C. R.

布氏說，馬克思指控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生產造成浪費，這是一回事，如何克服之，這又是另一回事。布雷克朋的言下之意是，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為日後以其名成立的政權，能以中央指令計畫，解決這個難題。他宣稱，在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，只能在《資本論》卷一，出現一次比喻⁹，讓人可以反推馬克思或許曾認為，經濟之運作有可能端賴「一個無所不在的計畫單位」。

但這只是比喻，萬一有人推定可以作此實踐，布雷克朋已預作了反駁。他表示，這種「孔德式的社會主義」，必然不可能是馬克思心儀的對象(Blackburn, 1991: 12, 注6)。其次，布氏從路線鬥爭的失敗者(如遭史達林處決的布哈林、遭人刺殺於墨西哥的托洛斯基)或具有浪漫革命形象的格瓦拉的著作，

(續)——

Mills)之言，為「建構推動變遷的國際社群」而作，並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接合，論述其必須、可欲及可能。他標舉米爾士的《馬克思主義者》一書，指古典自由主義最珍貴的部分，正在其可整合於古典馬克思主義。順此，凱氏提出了「頗具野心」、「雖說是策略，亦是規範」的「自我節度的革命觀」，說明融通兩者之間的路徑，必然是蜿蜒曲折，「充滿了驚奇與陷阱，吾人自當學習如何穿越。」凱氏又引用波蘭共黨時代的著名異端分子米希尼克(Adam Michnik)之語，指「唯有刻劃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所能交會的區域，民主左派的更新，始有可能」；惟凱氏論稱，更能提供思想資源，求使自由主義並容且豐富於多元主義者，是洛克、柏林而不是小穆勒或羅爾斯。(Katznelson, 1996: 9, 23, 51, 61, 71, 104; 另見*Economist*, 2002. 4. 27: 52對米希尼克的報導)錢永祥告知並贈送凱氏前引書，特此致謝。

- 9 這個比喻如後(Marx, 1868, 引自吳家駟譯文, 頁95), 「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, 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, 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。在那裡, 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, 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, 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。」

乃至於列寧與史達林的言論，援引他們對市場機制的支持¹⁰，試圖從中強化市場機制理當存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當性。

看在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眼中，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簡直是大逆不道，包括前者指控後者的方法論個人主義，違反了社會結構的整體分析¹¹。惟作為後者成員的羅莫爾，對此批評不

10 依其引述先後，摘要如後。德國社民黨主要理論家考斯基(K. Kausky, 1854-1938)在1902年的著作已指出，各生產單位之協調問題，「將最為棘手」，他認為在革命成功之後，收歸公營的部門必須與繼續存在的私營部門保持競爭，從競爭中證明優越性。稱考斯基為叛徒的列寧，其晚期的經濟思索，已較容忍「內部市場機能」、小商品生產與外資。史達林也承認行政指導模式之限制，以及對商品元素的依賴。布哈林(N. Bukharin, 1888-1938)主張運用市場，並與小生產者採取長期合作關係，眾人知之甚稔。托洛斯基(L. Trotsky, 1879-1940)固然主張計畫經濟，但認為計畫無法全面，他在1922年說，「轉型時期的各企業必須多少都各自進入市場關係，並歷經市場機能來淬煉自身……國營企業不僅必須承受來自國家機器的技術指令，它還得經由市場力量從下加以控制」；1932年托洛斯基則說，「設有普同之心存在，力能同時登錄所有自然與社會之所有過程，因此也就能夠測量它們的所有動靜，並據以預測它們互動之百般結果——這麼樣一個心靈，必能事先擬就無所瑕疵、無所不包的經濟計畫……科層組織經常自以為擁有這樣的心靈……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很輕率地免脫於市場的控制之外……(但)計畫有待市場之制衡，且很大部分必須透過市場才能實現……若無市場關係，經濟算計殆無法想像」；他在1933年又指，「衍生自資本主義的經濟與財貨計算方式，拒斥不得，而是要加以社會化」。歷來被舉為反官僚的國際主義者格瓦拉(Che Guvera, 1928-67)在1964年2月說，經濟計畫必須遵守價值規律，也就是要遵循市場關係，因為價值高低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，且需放在國際之間衡量，任何國家或可在特定(短暫的)期間，自行封閉而不理會其變動，唯長期以觀，必定不能。(Blackburn, 1991: 24, 26-30, 45-6)

11 有關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的精要闡述及其對批評者的回應，賴特之作可能最為清晰(Wright, 1989/1994)，但這仍無法說服他人，論者仍以更嚴厲的言辭，抨擊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。(Lebowitz, 1994)另有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學者認為，羅莫爾不強調市場的存在作為剝削的

以為忤之外，他更表明，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及均衡分析，大可接合於社會主義(因此才有本書在內的許多作品)。羅莫爾的一般剝削理論更強調，勞動價值論根本是錯誤的；但這並不妨害我們指控資本主義是一個嚴重的剝削系統。既有此說，則羅氏接續的推進就是，所謂資本主義將因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，以致持續出現利潤率的下降趨勢而進入最終的危機，亦難以成立；儘管如此，這並不妨害我們說，資本主義具有內在傾向，會出現週期的經濟危機¹²。反對勞動價值論、不談危機說，羅莫爾仍然反覆申明，以人之原初及其後「財產關係」，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核心概念，極其重要。他舉例論稱，剝削等現象

(續)——

前提條件，其實仍然可以相通於馬克思的看法，差別在於，羅莫爾不是如同馬克思的「邏輯與歷史」並重，而是獨取「邏輯」方法、他所服膺的新古典靜態分析可能構成了新古典「經濟帝國主義」的發展，也就是新古典方法運用於愈來愈多的領域。總結，他們的評價是，羅氏等理性選擇學派的人，糾正了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……對經濟模型的嚴密系統之闡述持漫不經心的態度」，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有益影響」。(Howard and King, 1992／顧海良、張新等人譯，2003: 351-2)

- 12 惟應注意，理解馬克思主義危機說的方式之一，本就不是指其長期的經濟衰退或停滯，也不只是指資本主義的最後死亡，而是指資本積累過程的中斷，以及資本重組自身的手段，以求開啓另一輪的積累。(Kenway, 1990)有關資本主義的積累危機及其出路(包括國家的介入，Held, 1983; Shakiah, 1983)，史威濟(Sweezy, 1946/1997)的古典著作仍是較佳的解說，他反對危機導源於各部門無政府狀態之競爭所出現的「比例失調」，而是主張資本主義注定產生的消費不足趨勢才是危機的根源。早年從階級鬥爭角度解釋西歐封建主義過渡至資本主義的布倫納，在其近作則採比例失調的視野，解釋戰後至1990年代末美日德的經濟走向。(Brenner, 1998/2002/2003)此外，強調在競爭未受總體協調之下，將因各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而產生危機之說，亦存在於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。(如Perelman, 1996/2000, 2001; Group of Lisbon, 1995/2001)

的產生，重要因素之一在於這個財產關係，而資本、商品或勞動力「市場」的存在，不是剝削所必要，社會主義因此不單無須拋棄市場，並且其實得更重用市場¹³。

海耶克等奧地利學派，固然對於馬克思批評資本主義是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」，嗤之以鼻(見後)。市場社會主義者則對此沒有直接或詳細的對話，楊克與布雷克朋似乎未能提及。羅莫爾如前所述，是在引斯帝格利茲時，形同間接承認了市場社會主義的競爭，勢將必須也比較能夠節制與協調競爭，從而減少浪費¹⁴。羅莫爾(Roemer, 1988/2003: 120)倚重甚多、也是分析馬克思主義要角之一的柯亨(Cohen, 1991)則似乎是在對比中央指令與市場經濟的二選一情況下，否定了浪費的指控¹⁵。

13 本書未直接作這些討論，本段所說的論點，另有較簡易的介紹(Roemer, 1988/段忠橋、劉磊譯, 2003, 特別是第五章)。

14 另外，來自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批評者，適巧說明，至少在心向資本主義的學人陣營中，羅莫爾模式的「市場」，顯然與資本主義的市場，並不相同。論者認定，既然公民的配給券不能自由使用，不能如同貨幣般購買現貨，投資則因非私人所屬的銀行之作梗，將要造成國家職能膨脹，而這些都不是「正常的」市場現象。(Wohlgemuth, 1997)劉世鼎代為從英國寄來這份資料，特伸謝忱。

15 柯亨似乎是少數市場社會主義的主張者之中，直接回應社會主義者對市場的批判。他說有關對市場的批判，原因可分做四類：(1)生產無效率、浪費、過度生產；(2)無政府狀態；(3)結果的不公平；(4)誘發人們生產的動機被定位在貪婪與恐懼、貪高薪、懼失業等。他同意後兩個批評，但認為需找第三條路補充之，不是完全要扭轉(3)或取消(4)。對於前兩者，柯亨斷然答覆，「傳統的社會主義觀點……沒有能夠認知到，毫無計畫的市場組織其資訊的效率，竟是如此之好……就此來說，米塞斯及海耶克是對的」。(Cohen, 1991: 17-9)柯亨顯係僅為對立中央指令與市場機制之別，別無深思，否則不可能說市場的運作「毫無計畫」，規模愈大的公司愈有計畫的擬定與執行，市場與計畫實非對立的概念，幾已是常識。(Auerbach et. al., 1988)